

介绍《中国植物志》

曾 建 飞

(科学出版社)

中国地跨温带与亚热带,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加之第四纪以来,大部分地区未受冰川的严重破坏,植物种类非常丰富。有许多重要的经济植物,而且残存有不少古老、孑遗、原始和特有的植物。例如,称为活化石的水杉和银杉等,为全世界所瞩目。为了促进学术交流,使丰富的植物资源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,1959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,组织全国 59 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。

《中国植物志》是多卷集,共 80 卷。它是一部总结我国现有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种类的基本资料,研究各植物群的名称、特征、用途、分布和生态环境等,为社会提供生物资源信息,对农、林、牧、副业以及医药、轻工业等生产部门都有参考价值。1959 年,第一本《中国植物志》(该书的第 2 卷,由我国著名蕨类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编辑,包括蕨类植物中的 13 个科)问世后,迄今共出版了 42 卷(或分册),引起了国内外植物学界的注目,被国外学者称为“植物分类学的巨著”。

《中国植物志》由于它的特色得到了植物学界的好评。

第一,《中国植物志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编写任务。在国外,完成的比较快的《苏联植物志》用了 30 年,其他如《巴西植物志》用了 66 年。有些植物志虽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,但至今仍未完成,例如《秘鲁植物志》(已用了 40 年),《东非热带植物志》(用了 23 年,距离完成尚差很远),《马来西亚植物志》(用了 27 年,仅完成了三分之一),而《北美植物志》、《植物界自然分类长编》等更是旷日持久,离完成之时还遥遥无期。一个国家能否自己编写植物志,不但标志一个国家的植物分类学水平,也是一个国家植物学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。《中国植物志》是世界上大型植物志之一,是我国植物学的最基本文献资料,也为我国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,它的出版对世界植物区系和植物地理学研究工作也是一项重要贡献。植物学家 I. C. 赫奇、L. A. 劳尔纳和 H. K. 谭在评论《中国植物志》时说:“要完成多达 80 卷、记载种数约 3 万种的植物志是十分艰巨的任务,它需要有丰富的分类学知识,充分的财力支援和有完成计划的坚定决心。这部植物志的内容不仅对中国人自己,而且对国际植物学和园艺学界都是极其重要和使人感兴趣的。”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出版“是对东亚植物研究作出的不朽贡献,也是对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们正确的工作和勤奋精神的颂扬。”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,靠某个人或几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,必须组织协调全国植物分类学家的力量,并给以各方面物质保证(如标本使用等)才能完成。例如,其中的第 2 卷(蕨类),第 7 卷(裸子植物),第 36、37、38 卷(蔷薇科),第 65、66 卷(唇形科)和第 74、75、76 卷(菊科)就是由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、郑万钧、林镕、俞德浚和吴征镒等和他们的学生共同完成的。

第二,《中国植物志》具有我国特色。关于编写植物志的目的,基本上有两种观点。一种观点把植物志视为鉴定植物的工具;另一种观点把植物志视为档案性的或百科全书性的工具书。按照前一种观点,不严格要求资料的来源;而后一种观点,描述和文献引证又过于繁琐。《中国植物志》扬长避短,要求描述明瞭而不冗长,文献引述也只引其主要者,使读者有据可查。这

对科研人员或生产技术人员都有实用价值。由于我国植物分类学界拥有一批国际上有影响的专家,有丰富的研究材料,其中不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研究资料还是首次发表,因此,引起了国际植物学界的高度重视。

《中国植物志》既照顾到我国分类系统的习惯,又考虑到使用的方便,对一些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比较大的科,编委会列为重点,优先考虑出版,对及时交流和指导生产都有积极的意义。

由于参加编写的作者多,各家的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,在编写过程中出现各执己见的现象是很自然的,特别是对“种”的划分,粗细悬殊,标准不一。通过中国植物志编委会,坚定不移地执行统一的编辑方针,实行严格的审稿制度,使《中国植物志》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。

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形态图,以其精致和准确而得到国外专家的称赞。1981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13届国际植物学会议期间,在著名的悉尼大学中心建筑专门举办了“中国植物图画展览”,在100幅展品中,绝大部分收自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原图。经报纸、电台广泛介绍后,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,获得了与会者和参观者的好评。

第三,《中国植物志》是一部在大规模考察基础上的高水平的著作。解放后,我国植物学工作者对植物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,为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提供了大量的标本。植物志中的每个科,包括了我国80%以上的种,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植物资源的概貌。对于各分类群的划分,作者们采取严肃的态度,慎重从事;编委会对每部稿件进行认真的审查,反复讨论,使《中国植物志》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。例如,《中国植物志》第31卷由于资料完整、学术水平高而荣获1982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。该卷包括樟科和莲叶桐科。樟科植物种类多,是构成我国森林植被最具有特征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成分之一,在经济上及科学上有重要价值。樟科的分系统争议较多,完成樟科植物志的编写工作难度较大。本卷作者们研究了全国各大标本室的标本,著名老分类学家杨衔晋教授等还到江西、福建等地野外考察,经过五年的认真研究,解决了许多难题,订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结论。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。吴征镒教授指出“樟科是中国植物区系中一个繁难的科”,本卷“彻底清理鉴定了国内各大标本室的全部标本,澄清了绝大部分原种的正确区分问题,对植物学、林学是一个重要贡献”。俞德浚教授认为该卷出版“为世界樟科研究填补了中国的空白,为中国樟科研究作出了新贡献。”美国哈佛大学S. A. 斯庞伯格博士对“短期内完成难度这么大的中国樟科植物志表示惊奇”,“我难以形容我是如何高兴地得到这些出版物,尤其是樟科植物志”。该校D. E. 布福特博士在给作者的信中写道:“祝您完成这一十分困难的樟科植物志。您的樟科植物志对每一个研究亚洲植物区系的人将是很有用的。”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L. A. 劳尔纳博士在收到本卷后给作者来信说:“您寄这本对我很有价值的樟科植物志太友好了。中国植物志出版这么快,太好了。”

《中国植物志》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;其中第7卷、第68卷以及第30卷第2分册、第63卷曾分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、三等奖和林业部等的奖励。

《中国植物志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,如种的划分不尽完全合理;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和研究的深度不一,各卷之间的水平亦有差别;编辑出版时间比较长,争取在1990年基本出齐也还要作出很大努力。

植物志的编写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,需要不断修订补充,要有一大批专家为之付出毕生精力,甚至是需要几代人努力。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辑出版已经为植物学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,相信在今后将要出版的各卷和不断修订再版过程中,《中国植物志》将会日臻完善。